

# 面向当代诠释传统

远方

是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心得，两位文化学者在较为宏阔的时空背景中深入交流、务实探讨，开阔了视野，深化了认识，给读者以启发。

两位作者一为有多年实际工作经验、担任过文化部门领导职务的作家王蒙，一为在高校多年从事文化理论研究、曾担任《文史哲》杂志主编的学者王学典。他们对“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”的思考阐释各有所悟、互为补充。比如，在理解“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”时，两位作者以《礼记》中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。5000多年中华文明，有太多应对预案和灵感渊藪，这使得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在艰难困苦中百折不挠、兴旺连连。作者还从人类古老文明兴衰中进行总结，提出中国文化讲究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。通变思想是中国智慧的重要体现。我们的文明随时代发展而不断自我更新，因而有能力持续回应新挑战，有能力不断成长、永葆青春。

又比如，在论述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时，王蒙认为刚健有为、积极作为是传统文化的主要方面，这是促使一代代中国的“脊

梁”充满家国使命感的精神源泉，并提出自己判断传统文化精华的几个依据：有利于人与社会的发展，有利于和谐稳定，符合人类文明共识。王蒙认为文化要传承创新，载体尤为重要。传统建筑、文物、遗址、典籍等是无与伦比的宝藏。同时，文化的载体更是人民的生活与实践。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至今活在重德、尚勤、厚道、重视家庭、珍视和谐等生活观念与实践之中，因而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来源于与现代结合的、生机勃勃的中华文化。王学典也谈道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“融入生活”很关键。文化艺术工作者有责任发挥好自已的作用，让传统文化精髓对接当代语境，给今天的人们带来精神滋养。

对谈录也探讨“推动文明交流互鉴”的内涵与启示。作者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加强对话交流，求同存异，相互学习，相互理解，才能共同发展进步。中国人历来重视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重视“推己及人”“天下为公”，重视“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”，文明交流互鉴的观念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，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重要的里程碑，正在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追求。文明对

话的出发点应该是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，求同存异、相互理解，未来才会更美好。两位作者共同认为，包容性、和平性和多元一体的特点，使中华文明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历久弥新、生机勃勃。我们今天倡导的文明对话与我们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，体现出中国气度。

该书在对宏大问题的探讨中，精到的观点和独到的论述俯拾皆是。比如，强调通用语言文字对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意义，以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之语论述孔子思想的世界意义，从《红楼梦》看封建社会的危机和社会进步的大势所趋，通过传统思想精髓的“社会科学化”推动“两创”……有思想的火花，也有鲜明的主张，平实自然，有益有趣。

时至今日，回望历史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文化自信，更加珍视我们的文明传承，更加自觉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希望该书的出版，能够帮助读者更加深入理解“两个结合”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增添思想文化的力量。

（转载自《人民日报》2024年9月27日第20版）



陈香

## 童年记忆书写的本真与力量

——评温建龙《行走的月光静悄悄》

成长是人一生的主题。成长小说将焦点放置在成长主体的建构上，通过各种叙事手段，创作出形态各异的成长主体，从而表达自己的主题意蕴。由此，书写童年记忆的作品基于不同代际作者的不同经验，呈现出风格迥异的成长图景，其后蕴含着成人作家对童年生命的思考，和对童年生命形态由衷的赞赏。不同时代个体童年叙事所展现的历史童年之景，既凝聚着作家难忘的童年经验与记忆，更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厚的内蕴中。

21世纪以来，将童年经验融入文学书写的儿童小说创作出现了一批精品，如《童年河》《苏北少年堂吉珂德》《吉祥时光》《红脸儿》《阿莲》等。这一股童年回忆性书写的热潮，虽然带领我们在个体童年的记忆中重返童年现场，但其志并非仅仅旨在怀旧，而是挖掘童年精神的内在本质，以指认现实的童年生活。温建龙的《行走的月光静悄悄》显然也是这样一本从自我的童年经验出发，却旨在为今日童年生活注入深厚生活感受、人生体悟的作品。

《行走的月光静悄悄》一开篇，描摹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北方一个普通乡间的风土画卷，一个普通乡镇中学开学之初的校园景象，把读者带入了作家的青春。童年记忆生长于作家个体内部，是其写作儿童小说最原初的动力和叙事资源。成长中形成的各种经验、感受都将内化于作家的生命活动中，个人的感受与记忆是核心与基础。

成长小说往往需要具有一定的时间维度，在行动元结构中，使成长这样一种基本的物质材料得到足够而连续的显现。就像一根长长的毛线纺织的过程，毛衣上的每个结点都相当于主人公成长的关键点；每一个结点叙述的完成，都标志着主人公的一次变化，在经历中可清晰看到其角色的逐步演变和转化。无数结点的连接，就是为主人公塑形。

作家当下主体的心灵体验，与过往童年世界的真切记忆相互碰撞时，既是时间的回溯，更是一次作家的精神还乡。当过去的人和事作为一种独特审美意识纳入自己的人生体验，又与当下的记忆与意识产生交叉重叠时，作家实际是在对记忆的回溯中，完成与当下儿童读者的对话。由此，小说通过日常的生活镜像，对少年的生命内蕴和精神特质予以真实的观察，对其身心成长秘密及自我体验做出刻骨铭心的探索。

时代背景是童年记忆生成的历史语境，每个作家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童年记忆，但个人经验的纯粹性也不是绝对的——因为每个个体都是一定历史和时代话语下的个体，拥有某一特定年代的文化印记。比如这一段，“此时，刘跃龙、陈朝旭几个同学正像往常一样，结伴而行，骑车向学校赶去……这时，东方的太阳越过了山脊，万缕金丝从他们身后扑射而来，像一把撑开的光金大伞推着孩子们的车轮，一路前行。”

书中还写到主人公的同学张志国，被社会青年逼退了学，而张志国对同班同学陈朝旭的嫉妒、加害，人性深处的黑暗，作者也并未隐晦。如果对历史、社会、人性的复杂性避而不谈，反而使儿童文学丧失了向文学深处探索的可能。童年真实面貌的存在，实际上是现实主义儿童小说艺术表现空间的拓展所在。当然，作者深谙儿童文学写作伦理，作品始终有节制叙写历史现场，书写童年向上的生命力。

那么，作家的童年回忆为什么能感动或触动当下的少年儿童？

我想，作为成人的创作主体在回望的记忆中找到最初的心境，审视并重塑了自我的童年，感知成长的经验人生的意义，同样也重塑了普遍意义上的童年。作家记忆深处的童年经验，随着故事的讲述进入小读者独特的生命空间中，作家在意识的最深处成为从前的自己，和现在的儿童读者相逢，和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儿童读者相遇，童年记忆由此实现自己最动人、最深刻的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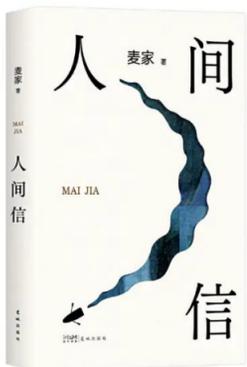
童年是有原型的。童年原型以共时性和带有作家个人生命体温的历时性特征不断发展，涌动着强大的精神力量。

（转载自《光明日报》2024年10月5日第8版）

## 从普通人身上发现信心和勇气

——读长篇小说《人间信》

徐阿兵



的长篇小说新作《人间信》（花城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，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“中国好书”2024年4月推荐书目），进一步疏离熟悉的题材和人物形象，真正实现了另辟蹊径。这或许是标志着麦家转型成功的一本书。

读完《人间信》，笔者深切感受到，麦家已倾力将他所感知的“世间的一切”摄入这“一本书”。在20余万字的篇幅中，一座偏远小山村的现代史，一个家庭的存续与变迁，一对父子间的冲突与隔阂，一些普通人的生死哀乐与爱恨纠缠，共同交织成人间画卷的一角。既然小说叙事容纳这么广泛，那么“人间信”这简简单单三个字能否统摄全书？事实上，汉语表达所具备的简练和精深之长，足以消除上述疑虑。单从“信”字来看，无论被用作名词意义上的书信、音信、凭信，还是动词意义上的相信、信从、信仰，或是形容词性的诚实不欺、准确无误、真实可信，“信”都联结着特定的人际关系，并指向明确的价值观念。展开来说，书写“人间”与“信”的遇合，可谓作家分内之事，而探究作家的叙事旨趣，则是读者的职责所在。

如果“信”是音信，“人间信”则是人间的消息。人间本是浑然一体，芸芸众生共同沐浴阳光雨露。但在广袤大地之上，山川阻隔，语言分化，风俗殊异，以致不少人所认识的人间不过是一角，甚至很难与其他地方音信畅通。小说中的双家村正是这样的人间一角。在很长时间里，“我”即蒋富春的祖辈、父辈所能接触的外部世界，其边界不过扩展到街上和镇上，但双家村绝非远离人烟的桃源胜地：外国侵略者到过这里，

以致“我”的父亲年少时曾被抓走又逃回；阿根大炮家先后有两个儿子从这里出发寻找部队；知青娄老师等人到过这里，革命风潮也从未忽略这里……从《人生海海》到《人间信》，双家村作为文学地理空间已初具规模，未来甚至可能发展为个人化的文学标记。但就目前而言，双家村并不以富于地方性的风土人情而独具一格，是广阔人间的缩影。不少人尝试过以极端方式离开双家村：奶奶离家出走，“我”从这里应征入伍，大姐和小妹远嫁外地。但他们最终或回到这里，或身在他乡而心系此地。双家村之所以令人爱恨交加却又无法真正摆脱，不仅因为它是那些人的故乡，更因为它就是实实在在的人间。小说并不以书写民族史、村庄史或个人成长史为追求，而是在从容有致地记述人间常有的各种消息。

“信”若解读为相信，“人间信”则关乎生活的信心和勇气。作品中的许多人，或许身份不够显贵，但都有自己的生活信念。母亲在重病时仍为游手好闲、毫无责任担当的丈夫百般开脱，这何尝不是一种“信”？正因始终相信丈夫只是不器成而不是坏，她才能做到几十年含辛茹苦操持家庭。蒋富春与父亲的巨大冲突，很容易被解读为少年的叛逆行为所致，其实根源在于父爱的缺失。成长道路上，父亲基本上是缺席的，蒋富春没有榜样力量的引领，他不自觉地要成为榜样，直到自己也成为父亲，才真正放下往事。史铁生在《病隙碎笔》中说过，人间的故事千变万化，但究其底蕴都会透露“残疾”与“爱情”这两种消息。残疾即残缺和限制，意味着

残酷的现实。爱情则是梦想和对美满的企盼，意味着对残缺的补救。在残缺的现实面前，人依然葆有梦想并为此努力，这就是生活的信心和勇气。《人间信》写了那么多冲突、矛盾、误会、遗憾，却依然带有光亮和温热，正因它敢于直面生活的残缺，并坚持从普通人身上发现信心和勇气。

“信”若解读为真实可信，“人间信”则意味着小说所叙述的人间图景真实可信。在新媒介时代，置身图像和声音叙事之中，小说家如何以文字叙事建构艺术真实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在《人间信》中，麦家对文字叙事独特性的充分认识，体现为对小说叙事技艺的自觉运用。比如，在叙述视角上，前半部分以“我”的口吻讲述不成器的父亲如何屡次令人失望，这在叙述上原本本无疑义，但叙述者时常引入“阿山道士说”“奶奶说”“母亲说”，不仅强化了叙述合法性，还使叙述过程本身变得摇曳多姿。小说还有意识地创设对话与互文的情境，以此引领读者在故事之外思考小说的意义与价值，这在最后的“众声”部分表现最为明显。

《人间信》结尾处引述了诗人安妮·卡森的话：“假如散文是一座房子，诗歌就是那火燎全身飞速穿堂而过的人。”至于何为小说，叙述者却未正面回答。上述解读或可用作答案：小说既从容记述人间的音信，又坚持发现人间的信念，更致力于使自己的记述和发现真实可信。一言以蔽之，小说是人间之为人间的凭信。

（转载自《光明日报》2024年10月9日第14版）

## “使我的同胞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”

宋泽滨



学术著作等身；作为重大航天工程的组织领导者，在多个工程领域取得重大成就；作为一位战略科学家，提出了许多有关科技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，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，成为全社会学习的楷模。笔者认为，最能反映钱学森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的一句话，无疑是在1955年9月17日登上返国邮轮前向报界发表的简短讲话：“我要竭尽全力，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，使我的同胞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。”

这是钱学森一生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。为此，钱学森毕其一生来践行这一承诺：早年留学美国，专攻航空航天技术，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；中年归国效力，为国铸剑，创造中国导弹、卫星事业的多个辉煌；晚年回到书斋，探索现代科学技术体系，深入思考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。

《剑指苍穹：钱学森的航天传奇》主要涉及钱学森一生的前两个阶段。

新中国成立不久，在美国留学专攻

航空技术的钱学森，便作出回国参加建设的决定。但他的回国路却异常艰辛——美国当局无理拘押了钱学森，在长达五年的软禁生活中，不能进行尖端技术相关教学与研究。钱学森后来回忆时说：“我决心要‘另起炉灶’，搞一门新的学问，以便能顺利回到祖国，我选择了工程控制论作为新的研究对象。”回国前，当钱学森带着刚出版的《工程控制论》向老师冯·卡门告别时，他的老师说：“你现在的学术上已经超过了。”钱学森后来回忆，听了老师这句话后“激动极了”，因为这是出自国际权威学者之口。

在党和政府的努力争取、大力关心下，钱学森带着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，于1955年10月回到祖国，开始了为国铸剑的辉煌事业。

钱学森回国的第二年，党中央决策发展中国的导弹事业，组建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，钱学森为首任院长。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，钱学森带领着几乎没人

见过导弹的年轻科技队伍，于1960年11月5日将代号“1059”的仿苏导弹发射成功，从此，中国人能够制造自己的导弹了。

1964年6月29日，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发射试验获得成功，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掌握了独立研制导弹的一套复杂技术。东风二号导弹的成功，为此后钱学森领导制定的“八年四弹”规划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钱学森一心为国铸利剑，十载奋斗两弹成。新中国有了自己的核盾牌，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。

钱学森与广大科技人员创造的“两弹一星”伟业，锻造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盾牌，巩固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，为中国人民挺直腰杆过上“有尊严的生活”目标提供了切实保障。

（转载自《文汇报》2024年10月1日第7版）

